智媒时代高校网络舆论生态平衡逻辑与引导规制研究

赵文婧 袁丰雪 *
（鲁东大学文学院，山东 烟台 264025）

摘 要：随着媒介迭代衍替融合与数字化生存格局建构的发展，基于智能算法技术驱动且兼具“双向自我进阶”、价值内嵌、群落融合属性优势与“智慧”“智享”等类人性、人机交互属性的“智能媒体”，在社会利益格局、文化形态、交往范式增叠交织的转型攻坚变革中，不断放大与聚焦潜在社会矛盾，助推风险社会的复杂化态势，信息文明时代的伦理关系亦呈现为“人与虚拟人、虚拟人与现实社会”的对话逻辑。媒介技术的革新与融合一方面为社会话语的释放提供巨大可能，同时也成为社会舆论生态演变的最直接推动力。[1] 网络舆论伴随社会结构异质程度的加深愈加情绪化、尖锐化、“外化”“泛化”、立体多元化，技术生态伦理场域重塑下，隐私与共享、秩序与自由、产权与安全等网络伦理关系受到挑战；而脱胎于公共领域、作为互联时代衍生产物的高校网络舆论，更是面临舆论传播主导“混沌”、意见分布场域割裂、舆论表达形态“畸变”以及秩序规制运行阻滞等引导困境，“算法平台＋社交媒体＋技术融合”的信息传播机制改变了高校网络舆论生态的平衡体系与运行机理。探析高校网络舆论生态平衡的有机组合配置、把握动态运行机理，加快建构舆论引导新格局，是贯彻党中央重要讲话精神，强化高校意识形态阵地建设的客观需要，对于优化校园舆论结构、建构长久和谐的高校意识形态阵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网络伦理；舆论引导；生态优化；智能传播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34（2021）12-127-05　　DOI：10.19483/j.cnki.11-4653/n.2021.12.041
本文著录格式：赵文婧，袁丰雪 . 智媒时代高校网络舆论生态平衡逻辑与引导规制研究 [J]. 中国传媒科技，2021（12）：127-131.

1. 风险与挑战：智媒融合时代高校网络舆论嬗变演绎“新场域”

算法与人工智能技术在计算机逻辑（Computational Logic）[2]、媒体传播逻辑（Communicative logic）以及社交逻辑（Social logic）[3] 共载的传播格局下构成媒介价值选择机制在数字条件范畴中的特殊“人体的延伸”。互联网变迁及其引发的信息革命协同媒体融合及其推动的舆论衍化，在深刻改变人类信息分发模式的同时，重塑了社会形态与权力交往关系，加剧舆论的复杂化态势。进而促使公共话语权迁移与网民心态失衡并存，算法精准整合引导与过滤气泡伦理困境相矛盾，“集体无意识”“个体非理性”的“责任分散”与“情绪、行为感染”交织叠加，意识形态阵地建设与主流舆论引领亟待创新，成为当下我国高校网络舆论场域的典型写照，揭示出置于社会舆论共性规律框架下，其特定主体与舆论生态关联所决定的差异化机理与时代表征。

1.1 高校网络舆论发展新常态

1.1.1 载体迁移：网络舆论引导对象社交化、隐匿化

社交媒体整合新技术驱动，促使话语权不断扩张的同时更趋社交化与群落化，多元媒体全覆盖与表达平台的混杂导致技术监管层面难以精准识别研判，高校传统议程设置能力和舆论把控能力受到冲击。高校网络舆论亦逐步从微博、官网论坛等公开性强、易受检测的“广场舆论”转变为微信、群聊等封闭性高、难以察视的“客厅舆论”。[4] 5G、区块链等技术泛在化潮流下，各式视频产品加剧舆情监测与分析困境，碎片化、事实片面化的短视频媒介形态更在加剧主流引导、共识达成难度的同时，暴露出当前网络情绪识别及处理技术对于隐匿舆情要素的把控依然受限。

1.1.2 技术赋权：“话语权回归”与新意见领袖的创生

伴随自媒体勃兴，技术赋权助势公众话语崛起，“媒介网络化发展”与“技术网络的泛化”促使自发媒体与个人传播日益凸显。依托互联网统摄下共生的多元媒体平台，大学生媒体、自组织话语群体以及学生意见领袖利用社交媒体网络组织文本、自由发表意见，汇聚舆论能量，形成与传统自上而下“瀑布模式”舆论把控相对的、反向议程设置样态的“蒸腾模式”，即萨托利“相互争衡的‘传播媒介多元主义状态’”，充分彰显大学生群体价值观与行为模式的多样易变、自我意识及个性鲜明突出的表征。

1.2 高校网络舆论场域新倾向

1.2.1 域限倾向：传播场域割裂与自我涵化导致共识缺失

依据不同媒体矩阵，高校网络意见分布场域呈现纵向“主流宣传—平台多方交互—群组议论”与横向大学

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基于网络伦理视域下大学生网络舆论引导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S202010451040）
（* 为本文通讯作者）

生异质群体集结而成意见园地并行的舆论格局，各圈层化舆论地带结合不同社交媒体平台传播属性形成舆论观点意见分布场域分散独立态势，平台层面较难实现彻底破壁融通。而以短视频为首的新型算法媒体经由过滤气泡标实现签化推送，在大学生自身认知偏差与刻板印象搭建的信息壁垒中，进一步放大“信息茧房”效应，从而引发高校群体不断自我涵化，形成固化思维，影响高校对严肃公共议题的组织把控，不利于其主流舆论统领和意识形态建设的工作开展。

1.2.2 极化倾向：言论表达陷入同质化与非理性

密度高、话题集中是高校网络舆论的显著特征。古斯塔夫・勒庞曾指出：“聚集成群的人们感情与思想全部投注同一方向，其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一种集体心理。”[5]大学生群体一方面针对网络舆论表现出其独立意识、涉奇心理与强烈的表达欲望，但处于三观塑造阶段的大学生自身另一方面亦缺少对事实的深度挖掘与本质性探究，极易人云亦云、陷入后真相的负面漩涡。与此同时，受感性形象思维、群体压力、归属需求与“认知闭合趋向”“认知图式强化”等群体心理支配，高校舆论群体往往陷入意见的“沉默的螺旋”，形成免责鼓励下的“集体无意识”及“个体非理性”。在社交媒体“回声室效应”作用下，虚拟分化圈层偏好选择与所在群体一致的观点，进而走向“内卷化”，并基于网络传播虚拟匿名、从众交互的心态机制，产生“责任分散效应”，群内同质、群际异质的极化现象愈加凸显。

1.2.3 情绪化倾向：传播感染呈现强交互与快响应

从网络议题流动形成“共鸣效应”与“溢散效应”的信息聚焦阶段，延伸至情绪升腾与波转的舆论扩散阶段，再到群体行为爆发的高潮阶段，依托高校“强关系网络”建构的高效互动体系，网络舆论事件与大学生群体情绪演变彼此助推，呈现一般问题热点化、私人问题公共化、普常问题政治化、局部问题全局化、简易问题繁杂化的传播规律。依据集体行为的“感染理论”，巴克指出情绪感染具有相互感染和循环反映的特征；而非理性情绪膨胀下“病毒感染”容易造成高校网络舆论主体意见表达的偏颇扭曲，遭受“民粹主义”“反智主义”思潮的不良煽动，孕育“网络暴力”“谣言传播”等潜在伴生风险。

2. 伦理与规则：网络舆论表达的边界与秩序

作为信息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技术伦理与网络生态环境伦理共同构成数字智能时代大数据网络伦理的二分奠基规制。前者侧重于探讨信息技术主体同所服务对象间、技术主体和社会关联之间以及不同技术主体间交往的原则与规范；后者则集中把握不同网络使用主体间其交往原则、关系与规范。人们在享受智能融合传播、数字互联技术红利的同时，亦不得不面对愈加严峻复杂的信息安全、信息污染、信息鸿沟、信息异化等伦理难题。在当下舆论监督自律、他律微弱，技术规制与道德评价缺位，且新的舆论表达与规约伦理尚未明确的舆论生态体系中，模糊的伦理边界与备受隐匿忽视的伦理规则易致使从属公共领域范畴的高校网络舆论一同陷入无序的失范系统之中。建构同高校网络空间适配的技术、生态环境伦理规范，有效界定伦理边界、调节失范偏向，是促进网络公共秩序及公共空间和谐有序发展的必由之路。

2.1 边界危机：网络舆论管控中的伦理困境

伦理的规制作用在于其内化的伦理边界的形塑。美国大数据、伦理学与社会理事会（Council on Big Data, Ethics and Society）围绕网络技术与环境将网络伦理概括为：信息总和所界定的数字身份（Digital Identity）、技术先占本质的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排他知悉权利的隐私（Privacy）、主客观合法权益保障的安全（Safety）、信息双方审核过滤与使用获取正当权益的可及性(Access)五个方面。由于技术程序和体制规范协约适配的滞后性，高校网络舆论作为整体网络舆论生态发展与建设的重要一环在其伦理价值目标的实现过程中，同社会网络舆论一样于多维共存的价值合理性中衍生出众多伦理冲突，主要包括：

一是信息共享与隐私、产权。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即倡导建构“网络命运共同体”，围绕平等尊重、创新发展、开放共享、安全有序四大核心内涵创立在互联网空间存在、基于世界各国共存互联、同商前途命运的有形或无形的团体组织，实现数据信息的公开与共享。同时，共享理念作为“十四五”规划五大发展理念的基础与目的，更是强调人作为伦理道德主体对于程序规范、评价尺度的先决地位。然而发展至今，浏览痕迹、大数据用户画像等“互联网记忆”层面的技术隐性窥视以及非法信息追踪扒取等人为的隐私泄露、乃至知识产权的无情践踏使得信息共享时代伦理矛盾随着智能技术的完善变得愈加深刻。

二是海量智库与信息真实。智能传播时代网络舆情发展将精确性让位于更快更多的数据可能性，社会单位一方面可利用大数据系统科学地分析并融入用户生活场景与社交网络，在人机融合中搭建多维数据库，以提供更优质量的媒介服务；另一方面，根据 Rothbaum“次级控制理论”，个人会因外部环境并非可直接接触的初级环境而失去对所处境遇的理解与控制，进而转向通过想象、幻想等感性方式予以解读与阐释，以缓解环境的未知所带来的焦虑。[6]由此，重量轻质的数据运转逻辑亦产制更多信息焦虑，经由想象与刻板印象的直接嫁接甚至不法分子的有意操纵，成为滋生网络暴力、谣言泛滥、水军炒作的温床。与此同时，媒体组织在总体真实与事功效率难两全时，往往采用事后追加澄清的手段试图弥补繁杂信息与碎片化事实解读所带来的失实，但仍不可避免地打破原生的真实检验系统，助势“后真相”负面效应蔓延，加剧网民心态失衡。

三是信息自由与网络秩序安全。同波斯纳“程序正义与效率核心”转嫁于网络舆情所揭示的彼此约束依存关系一样，信息自由同网络秩序相互冲突而又紧密相连。没有秩序，自由将不复存在；没有自由，秩序亦无所依托。天平的倾斜将走向网络霸权、个人主义盛行与批判宣泄情绪泛滥，亦或导致信息阻滞、社会生产与运转不畅。且网络自身的匿名性、及时性、开放性与互动性加剧潜

在表达危机；因此，网络舆论建设对于高校思想文化与伦理价值观念的深化提出了更高要求，应树立有边界的相对自由意识，强化高校网络舆论秩序建设，巩固在秩序约束下享受信息自由权利的网络伦理氛围。

2.2 公共秩序：网络舆论表达的伦理规制

数字信息技术架构起虚拟的网络空间，因而对于网络公共伦理行为的规约仍需回归到智能互联调试、信息技术程序以及协议的规范使用本身。作为信息哲学的创始人，弗洛里迪将道德主动体（Agent）、道德受动体（Patient）、讯息（Message）、实际信息（Factual Information）、壳（Shell）、信封（Envelope）、信息域（Infosphere）概念引入信息动力学中，并据此指出伦理学在公共信息活动中所产生的规范与教化作用。[7] 杜尔凯姆曾指出，价值评判、意义系统与规范体系的抵牾缺失是社会失范亦即其核心伦理道德失范的基本特征，智能融媒时代信息伦理问题同样随着互联数字技术的固有缺陷、法律制度的滞后以及大数据应用主体的道德缺失衍生并凸显其规制问题，外显与内化的伦理边界规范是维系网络舆论生态平衡的重要一环。

伦理规制是以主观伦理精神理念为基础并同客观社会约束相整合作用的制度化道德规范。美国学者查理·斯皮内洛基于网络伦理规制研究，提出了以网络技术为主导、与法律约束、价值规范、市场导向相结合的网络伦理技术论，[8] 其核心规制内容包括网络言论自由与内容控制、知识产权、隐私及安全等伦理关系失范问题，从而引导网络舆论空间有序和谐发展。而运用以伦理原则与义务为侧重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分析网络伦理问题，恰好与此互为补充，且诸如数字身份与鸿沟、知识产权与安全等网络伦理内容均可归纳统摄于马克思主义伦理体系的自由、平等、安全范畴之中。其伦理自由强调具备独立意志与选择自由的行为主体自发性地从善亦或是恶，并承担相应后果；伦理平等即遵循马克思生产关系平等公正的分配原则，实现包括网络技术发明者对技术独占排他的保护以及使用者对技术成果收益共享在内的共同诉求；伦理安全则指向国家公权力机关制度性他律约束，保障网络主体交往过程中的合法权益。[9] 由此，运用制度化他律引导自律的方式助推“网络人”成为“道德人”、“网络行为”成为“道德行为”，通过培育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规范网络道德伦理场域秩序，基于互利共赢公益关系的建构调适网络市场伦理场域交往，依据权利义务相统一责任意识的贯彻约束网络技术伦理场域行为。

3. 多元一体：网络舆论生态平衡的模型架构与引导路径创新

作为媒介生态研究的子领域，高校网络舆论生态是基于网络空间体系与现实社会环境、高校意识形态建设与媒体平台运营共同作用，在网络舆论传播规范与伦理准则约束下，传播主体围绕网络舆论的发展及演化相互影响、彼此制约形成的自组织动态系统。基于网络生态平衡关系的考察，本文在对新时代网络媒体环境新变革与高校网络舆论建设新面向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搭建了网络舆论主体、客体、本体、载体及干预体间相互适配与调节，技术、人文整合发展背景与网络伦理规制综合管控的高校网络舆论生态运行架构（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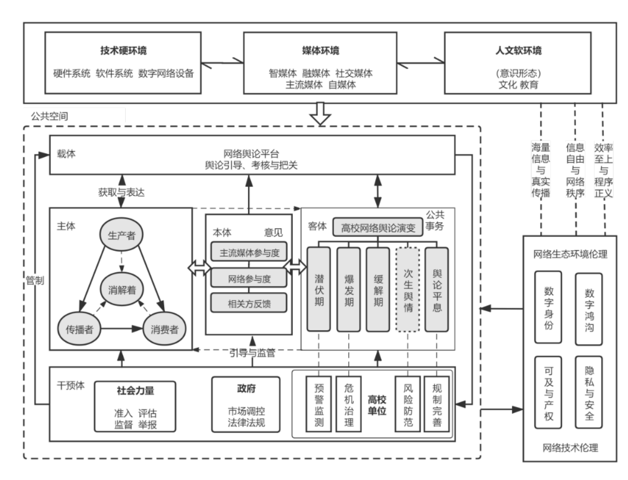


图 1 高校网络舆论生态结构模型架构图

结合架构所示，在网络生态公共领域内，高校舆论主体自由、本体理性流动、客体演化、载体把关与引导、干预体管控之间始终维持相互依赖、彼此牵制的共生关系，形成技术“硬环境”统摄、社会“软环境”共振、媒体传播环境共鸣同网络技术伦理奠基、网络生态环境伦理覆盖的舆论场域。立足于舆论自由等网络信息传播规范的高校网络舆论传播主体由生产者、传播者、消费者与消解者构成，通过由客体公共事务舆论的层层演化诱发的网络意见讨论、社交共享和舆论传播形成共时性意见表达或差异性舆论对抗，并因主流媒体参与度、网络流量及相关方反馈的有无、强弱而影响本体意见的聚合态势。载体搭建连通并深化各个环节要素的舆论平台，在赋予舆论主体获取与表达路径的同时肩负舆论引导、考核与把关之责任。高校网络舆论各节点均受以政府规制为总领、社会监督为辅助、高校单位治理为主导的干预体系管控，并随舆论演变阶段采取相应干预手段以确保高校舆论安全，实现有效引导。坚定不移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为智媒时代舆论工作导向的旗帜，架构以舆论生态平衡的环境与伦理两大维度为切入，各体系要素为基点，互为推进与制约，共同维护高校舆论生态的稳定正向发展格局，形成“多元一体”“一体多元”的舆论引导新范式。

3.1 创新网络舆论引导技术应用，强化智能综合规制

高校网络舆论引导需充分把握智能传播思维，有效整合大数据分析技术和互联网语言运用技术，深化“算法＋人工”干预体系的协调发展，增强话语转化表达能力。动态设置议题、把脉话题节奏，因事而化，因势而新。从“时度效”着力、应“时度效”要求。一是建构高校网络舆论分级算法预警机制，建构舆情演化阶段为层次的算法数据模型和分级指标体系，通过高效分级引导推动高校网络舆论引导由后置向前置转变。针对校园媒体和高校网络用户制定个性化算法指标推荐用户，实时监测不同介质和领域的媒介数据。二是合理应用算法推荐机制，

实现科学分类、精准推送与重点关怀、强化引导相结合。高校网络媒体要契合师生群体心理，发挥“两级传播”优势，精确对接、多样化表达，做到有的放矢，提高舆论引导艺术与水平。三是依循大数据智库系统及智能传播逻辑，提供谣言追踪、事实查询新可能。面对网络突发舆情，高校可依托大数据技术针对全媒体平台碎片化、非结构性意见表达符号进行研判、预测的分析能力把控危机传播，通过强大资源整合与信息发布能力掌握舆论话语权、主动权，破除高校谣言滋生空间。四是发挥智媒体价值内嵌技术属性优势，植入“主旋律”舆论基因，形成交互式引导。针对高校师生标签用户添加“推动型”亦或“规免型”关键词设置，拦截极端词汇信息，调试主流新闻舆论配比。增加主流价值观指标内嵌设计，塑造主流思想导向的舆论强势，打通并深化高校网络舆论生态的技术流动、物质流动。

3.2 把握网络舆论场域新业态，打造舆论表达新范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适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趋势，加快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面对高校网络舆论场域这一以大学生为主体从事信息传收、利益表达及意见交互的话语空间，媒体融合发展、转变话语表达已成为高校网络舆论工作的趋势导向。“三微一端”融媒矩阵搭载“视觉政治”、社群平台助势互联网模因迭代创作、网络意见表达理性与娱乐共存，共同架构高校网络舆论场域舆论“外化”“分化”“泛化”新业态，形成巴赫金“狂欢”语境下的舆论热潮，助推舆论热点转移升级。加强高校网络舆论引导工作，需进一步深化导向认识、规律认识、话语权利意识。一是严格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新闻记者提出的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要求，在复杂多变的舆情环境中，始终贯彻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落实高校舆论引导先锋作用。二是完善高校“把关”制度，培养“意见领袖”。根据格拉德威尔“引爆点”法则与巴斯“双重行为模式”，全方位、多环节、有侧重的监管舆论流向，预防舆情危机。三是敢于发声，准确发声。提升高校社会思潮辨析能力，强化师生“四个自信”，坚持落实“正面宣传”，严肃正视“负面议题”，关注大学生网络心理，主动回应师生关切。运用议题设置引领话语主导权，建构“主流叙事”，融合全媒体多样化表达，讲好高校故事。

3.3 规范网络伦理秩序，优化高校网络舆论生态建构

由网络技术和网络生态环境伦理构成的网络伦理是人们在网络生态环境中处理各类关系的原则以及规范系统化的思考。[10] 斯皮内洛曾在《铁笼，还是乌托邦》中指出：“网络空间的终极管理者是道德价值而非工程师的代码。”[11] 运用劳伦斯·莱格斯“网络行为规范力”理论，基于建构、自律、边界、监管等维度强化高校网络伦理秩序，以斯皮内洛网络伦理技术规制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网络伦理观为导向，整合贯通数字技术、道德价值与政治经济场域，深挖高校舆论生态平衡逻辑与运行机理，完善引导规制。一是重视信息技术伦理在网络伦理范式中的主导作用，确立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责任意识以规约网络技术伦理场域行为。彭定光教授曾指出，技术伦理问题的研究不仅仅在于技术的运用亦或是人际间的关系调节，技术生产设计亦至关重要。在技术生产中嵌入道德要素，使其在普及中自发开展调节引导活动，实现“架构的道德规范”。规范使用信息技术程序及数字协议，深入理解智媒体时代算法数据逻辑，实现信息正义、信息自由、隐私与安全、信息真实为核心的网络舆论引导伦理价值目标。二是增强网络主体自律意识，通过培育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规范高校网络道德伦理场域秩序，规范交往行为。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话语权，杜绝境外文化渗透和舆论倒灌，维护高校舆论表达的规则秩序和伦理体系。三是加快建构与网络公共空间相适配的网络伦理规范，确立规则边界。平衡工具理性、技术权威与程序正义、道德素养的价值合理性，健全表达规则、道德评价法律法规及相应的监督管理机制。打通高校舆论生态治理的伦理脉络，充分发挥舆论生态内部协调平衡与自我净化机制，在尊重其自身公共生态规律的前提下，给予合理调控及统筹优化，建构高效通畅、和谐开放的舆论生态环境。

结语

波斯曼曾在其著作《Technopoly： The Surrender of Culture to Technology》中指出，技术突破所释放的天量效能并非数量的增减损益，而是一种整体性的生态厘革。人工智能时代，智能算法媒体与大数据网络系统作为形塑网络舆论生态新格局的核心变量，在搅动舆论生态阈值和生态位宽度、引发舆论风险与挑战的同时，为维系高校网络舆论生态的动态平衡、推动网络舆论引导的路径创新提供新思路。依托舆论主体同舆论环境相互依存、协同进化，舆论能流一轴多向、整合转汇的协同运转，以及网络舆论能量场域话语、权力的社会能量控制与释放，网络舆论生态开放体系以技术环境伦理规制与智能传播技术创新为生态补偿机制，以网络法治及媒介公信力共振为冗余机制，以网络舆论表达转型与自组织功能深化为适应机制，推动网络舆论信息聚合、传播、共鸣、迭代、溢散等环节实现良性循环，充分发挥舆论生态综合协调、自我净化的平衡机理。[12]

高校网络舆论生态受到社会环境变迁宏观框架、技术与社会互动中观导向以及个体心理意识微观判断的层层把控，其环境变迁离不开互联网对于社交媒体与网络平台公众舆论的重塑，其生态平衡的维系亦由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大学生群体心理和社会转型视角、传播媒介属性的对流影响所决定。在尊重网络舆论生态自身规律的前提下，透析并勾联动力机制及逻辑演进，保持适度调控与统筹优化，平衡好技术创新与价值向善的关系，从而努力建构起长效通畅、智慧多元、正向驱动、开放和谐的高效网络舆论生态环境。媒

参考文献

[1] 喻国明，李彪 . 当前社会舆情场的结构性特点及演进趋势——基于《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2015）》的分析结论 [J]. 新闻与写作，2015（10）：37-40.

[2] Siapera，A：Understanding New Media，London：Sage，

2011：15-16.
[3] 喻国明，曲慧．“信息茧房”的误读与算法推送的必要——兼论内容分发中社会伦理困境的解决之道 [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1）：127-133.
[4] 雷森．智媒体视域下网络舆论引导新格局的构建 [J]. 青年记者，2020（8）：101-102.
[5] [法] 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M] 南开大学社会学系，译．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
[6] 秦雪冰．规则与伦理：网络舆论的表达边界 [J]. 编辑之友，2019（3）：72-76.
[7] Floridi L.Information ethics：on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computer ethics.[J].Eth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1999（1）：37-56.
[8] 吴文清，郭建萍．斯皮内洛技术实在论网络伦理观探析 [J]. 自然辩证法研究，2016（1）：36-40.
[9] 田鹏颖，戴亮．大数据时代网络伦理规制研究 [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221-227.
[10] 吉鑫．网络伦理学研究 [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11] 理查德·斯皮内洛.铁笼,还是乌托邦[M].李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44.
[12] 赵红勋，李宁宁．人工智能时代算法新闻的空间实践探析 [J]. 中国传媒科技，2021（6）：20-25.

作者简介：赵文婧（2000-），女，山东潍坊，鲁东大学文学院传播学专业学生，研究方向：媒体融合，舆论研究，跨文化传播。袁丰雪（1971-），女，山东临沂，鲁东大学文学院传媒系教授，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媒体融合、舆论研究。

（责任编辑：张晓婧）

（上接第126页）

能通过教科书里的网址来访问相关资源，也可以在资源中心的网站上搜索材料所属的图书，并且还有互动课程、在线课程、教学法、学习软件等的衍生。

回看我国现状，高校网络课程是在一个非常时期推出的，可以说是疫情迫使了它的出现，而在疫情趋于稳定之后，随着校门的重新打开，网络课程逐渐消失。纵然我国网络课程确实存在无数的局限性，亟待发展、进步，但“消失”绝不是一个理想态势。随着后疫情时代的到来，教学资源应逐步向线上开拓，才能应对未来的每个考验。

每个学校的网络课程水平实际上是每个学校教学资源发展的外化，而每个学校教学资源的发展无不依赖于学校基础设施的运作——网络化、数字化，从而服务教学平台。大学出版社无疑是除图书馆外拥有最多资源的地方，如何借抗疫期间网络课程的概念，建立起可持续发展、进步的教学资源传播平台，是后疫情时代大学出版社的使命与担当。

上述三类出版物可以说是各大学出版社一定图书占有率的共同体现，这三类出版物都裹挟着极为丰富的作者资源、内容资源，如何使得资源最大化地反哺大学出版社的发展以及推动大学与大学出版社的共同发展，实为“融合发展”带给出版业的一大思考。

结语

我国大学出版社从成立之初至今，一直承担着大学教学科研的发展与建设、肩负着学术文化传播的使命，在经历改制变革，逐渐与市场化发展接轨的同时，始终着眼于核心竞争力与地位的树立。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数字化出版应运而生，为许多出版社带来了新的发展与机遇。我国大学出版社普遍固守于“学术出版”的共识，并没有跟随数字化的浪潮实现转型，且应对数字出版的能力裹足不前、参差不齐，仍旧处于比较薄弱的阶段。面对疫情的到来，受限于固有流通方式的转变，因而表现出极其窘迫的一面。

而此时，“融合发展”概念的推行，原为针对教育教学资源支撑高校教学而提出，迁移至大学出版社的新态势发展，实为一剂良方。作为大学出版社，面对后疫情时代的到来，应对未来的变化与挑战，理应担当起这份责任，让出版社更好地适应新媒体、新技术下的学术传播和更大的出版市场环境。

注释

①北京市语文特级教师徐克兴如此评价《5年高考3年模拟》：实为高考科学备考领军之作，集学考之精粹，成名世之奇书，有助于迅速提高考试成绩。媒

参考文献

[1] 杨雪梅，包文峰．新形势下大学出版社发展的几点思考 [J]. 中国传媒科技，2021（2）：17-19.
[2] 赵中平．新冠疫情下大学社数字出版发展探析 [J]. 现代出版，2020（5）：85-88.
[3] 张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数字出版发展研究 [D]. 保定：河北大学，2020.
[4] 潘秋华．融合出版背景下中小型大学出版社营销转型的思考和探索——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营销转型探索为例 [J]. 中国传媒科技，2020（11）：18-19.
[5] 高玲．融合发展下大学出版社人才需求变化与应对 [J]. 传媒论坛，2020（20）：97+99.
[6] 冯卫东，张明星，李晓嵩．知识服务视角下大学出版社融合发展路径探析 [J]. 中国传媒科技，2020（7）：23-25+43.

作者简介：李忆泠（1992- ），女，浙江台州，中级编辑，研究方向：音乐教育。

（责任编辑：胡杨）